

腔调



“对那些有经历的人而言,‘服从命运安排’从来都不是贬义,它不是一种消极的放弃抗争或者妥协,而更多意味着坦然的接受,生命的丰富性在于,它从来不会被外在的什么力量界定,而更重要的,是在被安排的人生里,你能从中开掘出没有被安排的缝隙自己去填充。”

沈琦琦笔下的天才们,无不奋力在做着这种填充。”

——李光敏、刘晨茵《当女文青遇上苗师傅》



“在小的尺度上,蚂蚁是一个重要级的传播者。它们擅长收集种子,将种子种植在最佳生长地点。鹿群是更为漫不经心的园艺家。从一粒种子的角度来看,最美好的命运莫过于被一只蚂蚁挑中。而从整个物种的角度来看,足迹散漫的鹿群,可能会带上它们漂洋过海。”

我们能抓住的风中碎片越多,演化之书就能获得越多的材料来重新书写传奇。”

——豌豆妹《院落情书》



“整整一个夏天,莎士比亚书店门口的小黑板上都写着这么一句莎翁说过的话:夏天,每一首歌,都把自己唱响。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礼拜,很快,这小黑板上的内容,就会换成一首秋天的诗。所以我们就用三个小时的《奥赛罗》读书会,来和夏天说再见。”

——舒畅《书店里的莎士比亚》



“看山看海,生命大体就是这么各行其道,为了缘分或其他什么,偶尔会碰上一会儿。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,一旦用文字记下,就有了重量。这文字的重量便是生命的重量。奶奶的存在、血脉的延续再度被发现、被赋予,这就够了。哪怕这样的存在,必然,伴随着深深的悲伤和无奈。”

无奈本就是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感觉,只有面对它,才有最后的诚实与不诚实。”

——一念《留味行,抱着孩子过年的心情》

“有风来”:基于新鲜的、有范儿的文艺活动,做有腔调的文艺评论、影评、书评等,每周一至周五推送,让你美一美。欢迎更多腔调人士加入,云世界再美,也要一起去吹吹风。自荐、投稿请发 youfenglai2014@sina.com。更多寻美体验,请添加“有风来”文艺阅读微信公众平台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。



偶像



## 愿你孤独中也有慰藉

淡豹

轮到中国了。自传音乐人莱昂纳德·科恩传记《我是你的男人》英文版出版,旋即有了从德语到斯洛文尼亚语等诸多版本。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译作,令中国读者可以读到这部细节生动、充满深情的传记。

也确实出版一本权威详实的科恩传记的时候了。1934年生的科恩,如今已八旬,进入了摇滚名人堂与歌曲创作者名人堂,算手持终身成就奖。介绍科恩时,人们通常会强调他“写歌大师”的身份。这不仅因为他是既创作歌曲又演唱的“唱作人”,而且是因为科恩在音乐人身份外,首先是一位诗人与小说家,他文学性极高的歌词,荡漾着节奏感、诗意与恒久神秘。

科恩出生于加拿大,大学时已经写诗,二十出头就在加拿大诗坛成名。例如那首著名的《一千个吻那么深》就来自于他早写好的诗。他36岁时才举办第一次北美巡演,其实那时他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过七本诗集和小说。《我是你的男人》中,西蒙斯描述科恩对字句的苛求,“他会花四年时间来写一首歌词。他会一直写一直写,等写出两万句诗行后,才得到一首他满意的词。”

在音乐人之外,科恩的另一个身份是……和尚。对,他是位领证儿的

注册和尚,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洛杉矶附近一家禅宗寺院静修五年。欧美流传很广的一张照片,就是他坐在禅院内土地上修禅的模样,穿着布袍盘腿而坐,剪影柔和,却有钢筋塑成一般硬而平静的质感,阳光斜射在他戴着雷朋飞行员墨镜的脸上。这照片给我印象很深,那副墨镜在照片中显得不太协调,倒似乎恰恰浓缩了西方世界60年代以来的巨星文化的特点,将商业、博爱政治、神秘宗教三者奇妙地融汇一体。

我听过两次科恩演唱会,都在芝加哥。第一次是2009年,科恩不显老迈,戴黑礼帽,穿标志性黑西装,小兔子一般跳上台,开场:“前些年,我找我的一位老师聊天——他现在102岁了,那年他九十六七。我们聊天,喝酒。他举起杯子,说,原谅我还活着。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。”话中的那位老师,指的就是他的日本禅宗师傅。

科恩的诗和歌,都是朴素小真理和对朴素小真理的轻度怀疑。他问问承诺,再想想不确定性,靠近人,再质疑孤独。这让他歌像圣经故事般简单复杂,而他则是从未相信过自己的预言家。他的繁荣、破产与破产之后的巡演,似乎也像是个西方世界的寓言:60年代的社会批评终究落成8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,进

入21世纪后,科恩偶然破产,而2008年他重新开始全球巡演时,西方世界赶上了金融危机。

我听科恩演唱会时,台下听唱诗的,除了极少的非主流年轻人外,大部分听众都戴着一张退役银行家的脸。在金融危机下聆听科恩,一齐梦回上世纪的听众,或有些微风沙走石的伤痛,但绝无死灰孤悲的感慨。一同唱过“我们做点疯狂的事吧,我们做点错事吧”的人们,青年时冲锋,中年后发福,修禅的与做并购生意的或许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,有人破产,有人从他人的破产中致富,但演唱会绕开政治、不提历史,满场荡漾的是一团缅怀青春的小哀伤。

与谅解与死一样,宗教、无常、爱与性都是科恩常写常唱的主题。但他最特别的一点是,他写的是爱中的孤独,而不是无爱的孤独。没有谁不写爱的伤,有人写求之不得,有人写爱之痛,科恩写的则是人处在亲密关系中时特有的那种孤立无依的疏离感。我想这类似于面对神或生命时的那种感觉:笃信,不能不信,愿意相信,可又孤立无援。只能靠信撑着,感到的则是孤独。

在芝加哥的夜晚,加演六首后,他向观众道别:“愿你身边围绕着朋友与家人,不然,愿你孤独中也有慰藉。”

人物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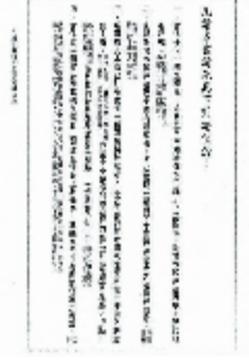
Leonard Cohen (莱昂纳德·科恩),1934年生,飘泊在现代都市的游吟诗人,来自寒冷而富有浓厚欧洲气息的加拿大小城蒙特利尔,英国文学是他的专业。早年以诗歌和小说在文坛成名,小说《美丽失落者》被评论家誉为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之作。很偶然的机缘将他带入民谣领域,在Judy Collins的帮助下,将他的诗配上简单的和弦,开始游吟生涯。他先后出版了《莱昂纳德·科恩之歌》(The Songs of Leonard Cohen)和《来自一个房间的》(Songs from a Room)等专辑。



故纸

### “两部半”中国通史

## 历史教科书的民国味道



曾福泉

说起历史教科书,想到了什么呢?是催人沉睡的秋日午后,历史课堂上,怎么也听不入耳的先生的声音,和怎么也看不入眼的一行行文字?

还是掏出笔来,给老照片上的袁世凯戴上墨镜,或是帮画像上的轩辕黄帝涂鸭一副更潮的装扮?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对历史教科书刻板无聊、历史课枯燥乏味,学习徒为应付考试。

这就造成我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时常能看到的场面:许多人,一方面是出于“反洗脑”的强烈愿望,狂热地拥抱那些“教科书上不会告诉你的事”;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素养和思辨能力的严重缺失,结果装了一脑子错漏百出的“野史八卦”却不自知。

好的历史教育、好的历史教科书,是多么要紧啊。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,著作等身的大历史学家为小学生编写历史课本,就是为了在民族新生、国运激变的关口,塑造一代新人。

由此,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,先后有“两部半”中国通史问世,体现了那一代学人贯通中西、融汇今古的独特气质,形成自梁启超、陈寅恪等名家之后的又一盛景。

其中,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广受各阶层欢迎,至今仍有人置于案头不时翻阅;吕思勉的《中国通史》尤为专业研究人员推重;而那“半部通史”,则是张荫麟草撰的《中国史纲》,可惜,书未竟而身先去。

让我们来翻一翻这几本大半个世纪前的教材吧。先看《中国史纲》,作为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教科书,张荫麟君文笔流畅粹美,深可玩味,阅之不倦;他对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天才的把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更引人惊叹。看看他是怎么向学生介绍楚国的:

“……这两种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,和北人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。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。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神农,而是飞扬飘渺的火神;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,而是含颦宜笑的美女。楚人神话里,没有人面虎爪、遍身

白毛、手执斧钺的蓐收(上帝的刑神),而有披着荷衣、系着蕙带、张着孔雀盖的司命。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糶腥,而是葱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;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,而是采衣妓服的巫女。再从文学上看,后来战国时楚人所做的《楚辞》也以委婉的音节,缠绵的情绪,缤纷的藻藻而别于朴素、质直、单调的《诗》三百篇。”

短短三百字,文采飞扬,妙语连珠,对楚人生活的刻画和特性的提炼,可谓深刻。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经济生产方式上的不同,将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,世界观,并且体现在文学艺术上——这番道理,又何及这段文字生动呢?

再来读《国史大纲》。钱穆的风格,是一个典型的儒家,深沉、长远,时刻想的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因此本书谓之“大纲”,人物典章都是点到为止,对于我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则是反复阐述。尤其是开篇时作者当头棒喝的那四句话,真是黄钟大吕,振聋发聩:

“凡读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:

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,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,对其本国已往历史,应该略有所知。

二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

三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,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,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,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,一切诿卸于古人。

四、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,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”

钱穆念兹在兹,正是这一种对本国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,大抵类似于陈寅恪所说的“同情之理解”。当其时也,外族来犯,家国有殇;而自“五四”以来,激进思潮和疑古派并起——这两种时代的因素,恐怕促使他发此疾呼。而发现、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源,则应是一以贯之,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要的事业:历史教科书当承此教化重任,使“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”,具备基本的历史素养。

最后到了吕思勉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,相较上述二者,这本书更加专门和精深,是给文史专业的大学士准备的;全书史料之丰富、考据之精当,业余想做些历史研究的读者拿来做工具书也很妥当。

全书分为上下两编。上编梳理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形态,下编是编年史。说到典章文物,书中有“婚姻”、“官制”、“选举”、“赋税”、“衣食”、“住行”等十八章……无所不包,历朝历代、前后源流,翔实精炼——这与吕思勉的治学精神密切相关,他读书极勤奋,据说光二十四史就从头到尾读过三遍。

就比如说喝茶吧。吕先生生书中遍举史料,指出茶风行全国,是从唐朝起,唐中叶后才有茶税。金朝的茶,全要向宋朝买,因此规定七品官以上才许喝茶。总而言之,即便在宋元时,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。同时制法也不同。前阵子有的历史剧,讲的是汉朝事情,却常常有“奉茶”的说法,倘能翻翻史书,就知道错误何在。

这三本著作,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教科书应有的参考:生动可亲又内涵丰富的选材和文字,立意高远的使命感,以及丰富细致的史料及其传递出的脚踏实地的治学方法。

风声

## 世上的河流

海飞

我站在村外河水的浅处,直往东南方向行走。日光高远,层层叠叠地拍打下来,水面漾着整片白晃晃的光芒,让我睁不开眼睛。我想那一定是我的童年,我的童年里小伙伴们像木偶戏里的木偶,他们和我处在同一条河,像一起上演一场默片。童年无比寂寞,我们在寂寞中逆流而上,两条瘦腿插在浅浅的河水里,一路挖蟹洞里的螃蟹。最后我们从丹桂房沿着河水一直走到了大悟村,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。水的声音低回,鸟阵铺天盖地地从我们头顶飞过,蹿进绿油油的树林。

在我童年的眼里,大悟村是一个桃花源。我久久地站在浅水里,望着不远处岸上新鲜的大悟村发呆。我认为大悟村成群的房子和树木背后,深藏着一个谜团。

我随时都能想起我出生在一座叫“枫江”的桥上,那座水泥桥是诸暨通往绍兴的必经的公路。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八,冬天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。我年轻的父亲拉着板车出现在枫江桥上。板车上铺着温软的稻草,稻草上躺着年轻的母亲,她的肚皮高高隆起。他们是去医院生孩子的。那时候已经黄昏,鸟群开始回巢,一个孩子没来得及赶到医院,就在桥上出生了。这个孩子就是我。

所有的一切,都是在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,父亲不急不缓地告诉我。他捧着一只搪瓷茶缸烤火,屋后院的竹子被积雪压折,发出啪啪的响声。我坐在炉火的边上,想象我出生的年月,我突然想到,来到人间的那一时刻我能听到桥上隐隐的水声吗?

我现在仍然对大悟村心存美好的向往和深深的恐惧,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村庄简直不是人间。偶尔,会从村庄的深处骑行出一个穿深蓝色直通裤的女子,二十寸的脚踏车,长发披肩,是一九八三年左右的美丽。这样的美丽干净、清爽,散发出肥皂的气息。而我是懵懂、混乱、脏、和自卑的少年。我更喜欢我出生时的那座枫江桥,仿佛在桥上我便能窥见自己的灵魂。我也喜欢在桥上听水声,不时有车子从我身边一闪而过,呼啦一声,像转瞬即逝的妖怪。

我想,我整个的童年时光,其实全被河水打湿。湿得像一望无际的岁月。

我想有时候我是在选择虚度光阴的。

我用我整个的少年上山,像一个去“假壁铜锣”山顶请香的道士。有很多时候,我会长久地守着一汪清澈得让人无地自容的山泉。那山泉来自于山顶的某一个地方,显然我是找不到它的源头的,我对源头也不是十分感兴趣。我只知道它来了,十分安静地俯卧在我的面前。所以我会蹲下身来,掏起一捧水喝。那汪山泉周边,全是潮湿的枯叶和败草,显出阴冷的气味。我把这从上游落下来的山泉,叫成一条山上的河。

我觉得我就是那汪隐秘的山泉,我都没有搞清楚那些败叶的脉络,我只知道它们阴暗与潮湿。我走到太阳底下的时候,我的少年变得阳光起来。我的眼睛长得比较细,我眯上眼睛的时候,差不多就是闭着眼睛。在我闭着眼睛里,晃荡起来的镜头是狭窄细小的山泉从天而降。

少年晨光,一直有一条河水在我的梦境里游动,像招摇的水草,像村庄上空的炊烟。我相信世上所有的路其实是相连的,如同世上所有的河流,会有同一个隐秘的源头。

